

第五章 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分析

第一節 中正紀念堂開發歷程

一、歷史背景

現今中正紀念堂用地在日據時期是「山砲隊」和「台灣步兵第一聯隊」營房。到了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後，國軍便接收了營房和設施，設立「陸軍總司令部」(營邊段)，於是這塊用地就以軍事用地保留下來。後來政府鑑於台北市工商業長足進步後，帶來了市區交通問題，同時營邊段的各軍事單位，又因設在市區內，殊感不便，因此國防部、財政部有關單位幾經磋商決定分別遷移至郊區，但因遷移經費甚大，而且營邊段土地又缺乏處理計劃，所以先行籌組營邊段可行性研究小組，對該地區的開發做研究。

研究小組經一年多委請國內外專家研究，於1972年6月提出二個可行性方案：第一方案是建議政府，將營邊段闢建為公園，理由是台北市區內的綠化面積不夠，所以希望將該地段闢建為公園，以增加市區的綠化和空氣的調節。第二方案是將營邊段闢建為台北市第二商業中心，因為當時台北市具有歷史性的城中區、龍山區及延平區已發展至飽和點，而且這些地區的交通、道路、建築物、工廠等，在以往缺乏有系統發展下，蓋商業中心徒增困擾，如市政府實施都市更新，又缺乏龐大的資金，所以計劃將營邊段闢建為台北市第二商業中心，以解除西門鬧區都市人口及交通壓力。關於第一個方案，政府認為其缺乏對土地利用價值深入的研究，所以決定放棄。於是決定組成「營邊段執行小組」負責籌畫第二方案等實際工作，並決定於1974年6月開始執行這項方案。

這項計劃是由財政部、交通部、國防部、觀光局及台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策劃，政府與民間將共同投資新台幣一百五十億元在台北市信義路的「營邊段」建設六十二英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開發內容包括興建五座十八至五十層樓不等的辦公大樓，三座廿四層至卅層的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四棟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貿易中心、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等，大樓間以輸送系統連結，行人以履帶運送(台北畫刊六十七期，1973.7)。

但是這項計劃因著 1975 年蔣介石過世，便迅速地改為中正紀念堂用地。於是「現代化都市」的美夢便由中正紀念堂給取代，改變了該地的空間意義。可見「戰時首都」所含攝的復國意識形態和威權政治，與「現代化都市」的追尋，這兩種都市意義也有潛在的衝突。在這二種都市意義的角逐過程中，何以中正紀念堂能取代現代商業中心，在許多的文獻中並無具體記載。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當時的一些意識型態來解讀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之氛圍。

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台北市便成了「戰時首都」，這從蔣介石的訓示中便可瞭解：

「現在我們是處於戰時戰地，時時刻刻都在備戰狀態之中，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戰時之首都，以台北市改為院轄市的目的，即在建設其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以適應戰時之需」(蔣公特准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在主持國父紀念月會時之訓示，1967.6.27)

「建設現代化之台北市，亦即可謂為建設現代化新中國之起點」(蔣公在第八十七次總動員會報之訓詞，1967.7.5)

在蔣介石的訓示中，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現代化都市，乃為適應戰時之需。因此，1974 年預定執行的「現代化商業中心」案，在 1975 年蔣介石過世而胎死腹中，被「中正紀念堂」所取代，在當時的環境下，似乎是理所當然地；因為，就當時國民政府政權而言，現代化都市的建設最終目的是為反共復國，而蔣公是反共復國的精神象徵。

蔣介石過世後，「蔣公精神」便成為凝聚民心，共同反共復國的力量。因此，不論政府官員或民眾，紛紛發表了許多激勵人心、可歌可泣的文章，政府也制訂了一些誌哀辦法，諸如：全國軍公教人員應綴徽章一個月；全國各部隊、機關、學校、軍艦及駐外使館等自即日起下半旗誌哀三十日；各要塞、部隊及軍艦均應自升旗時起至降旗時止，每隔半小時鳴放禮炮；全國各娛樂場所，應停止娛樂一個月等。教育部也提出紀念蔣公之方式，諸如：民族掃墓節、蔣總統誕辰紀念日、紀念歌、銅像、遺像、將蔣故總統的豐功偉蹟編為課材及於台北市興建一座「中正紀念堂」等，關於中正紀念堂的部分還指出所需經費除政府撥款外，可接受各界自由樂捐，其他各地不用分別另建。

為了紀念蔣介石，在市議會中也有許多相關提案，例如高金殿等四位議員提出「為悼念故總統 蔣公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並使國

人永遠追念其功德，特建議將敦化南、北路、士林區分別更名為中正路、中正區，南北高速公路定名為中正高速公路，並將青年公園或第七號公園更名為中正公園，在園內興建中正紀念館」(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十一卷第七期)。周英英議員提出「故總統蔣公不幸崩殂，山河變色、天地同悲，為永懷遺愛，建議速建北部公園，定名為中正國家公園，蓋北部國家公園有故宮博物院、內雙溪、五指山、野柳、金山、七星山、陽明山等象徵我故總統蔣公功蓋宇宙，德配天地，請速協調省政府進行，以表我全民之敬仰之忱。」(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一期)。

除此之外，市議會中也常常探討蔣公精神，如當時市議員¹曾質詢台北市政府對總統蔣公遺訓，是否列為今後施政方針？實施構想為何？當時的答覆狀況如下：「本府施政方針，一向秉承總統蔣公『建設台北市為現代化都市，適應戰時需要』的訓示而努力，同時也以蔣公『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的最高指導原則為準繩，過去如此，今後更是如此。把市政建設工作和光復大陸國土的工作相配合，齊頭併進。」(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一期)市政府並鼓勵市府員工與學生研讀《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一書，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激發愛國情操。

這種將蔣公精神潛移默化至民眾生活，是同時透過各種方式在進行。彭懷恩(1997)就指出，國家主義和歷史文化意識的形塑，以非組織方式穿透到各地的文化活動，甚至人們的日常生活理念之中，大致可歸結出以下一些「潛移默化」的運作特徵：

- 1、權威化：建構歷史文化的權威性，藉由傳統的權威，達成文化主導和教化的功能。
- 2、儀式化：形塑各種符號象徵和慶典儀式活動等等，以傳遞國家意識、凝聚人民的認同。
- 3、規律化：透過對時間的安排、空間的劃分等機制，進行對個人的身份地位、階級、成就、行為規範等方面的界定。
- 4、神秘化：國家如何將意識型態轉化為人民的「常識」，很多常識都被視為理所當然，很少人會質疑常識的合理性。
- 5、個體化：國家意識必須能穿透到每個國民個體，建構公民角色的自我意識和認同，即形塑出一套共有的公民意識和生活規範。

「蔣公精神」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來展現，而「中正紀念堂」的建設，就是透過有形的實體來體現這種精神。

¹ 質詢議員：周洪根、王友祿、林振永、林穆燦、莊阿螺、黃世溫、黃馨葆、周陳阿春。



圖 5-1 現中正紀念堂用地原本開發設計圖
(資料來源：台北畫刊第六十七期)

二、建堂過程

蔣介石於西元 1975 年 4 月 5 日去世，6 月行政院接受各界建議與治喪大員會議之決議，決定在台北市興建中正紀念堂，並即設立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積極推行建堂事宜。1975 年 7 月 2 日，籌建小組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決定以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東、愛國東路以北、信義路以南之間地段為建堂基地，並將區內林森南路轉入地下，進行整體規劃；8 月，小組公開徵求海內外建築師提供建築設計構想，聘請專家初審，選取五件，再經由國內外專家複審，最後採取楊卓成建築師之設計。於 1976 年 10 月 31 日，蔣公誕辰紀念日舉行破土典禮，1977 年 11 月動工興建，1980 年 3 月底完成，並於 1980 年 4 月 5 日正式對外開放。

關於中正紀念堂的競圖過程，頗有爭議。1975 年 7 月 23 日公告競圖，表明內容為建築物（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和公園二部分；設計要點為：（1）表達中國文化精神。（2）創造新穎設計，並具有莊嚴而獨特的風格。（3）有效應用現代建築工程技術，講求經濟實用。1976 年 7 月 9 日揭曉，第一名是和睦（楊卓成）、佳作分別為：三大（許文傑/陳永男/黃照國）、沈祖海加宗邁、莫晨峰、藍銘光（劉麗梅，1976）。競圖的公告中並沒有說明要北方宮殿

式建築，當時只有楊卓成的設計是宮殿式建築，最後是以楊卓成的設計拔得頭籌。根據石國宏（2001）針對中正紀念堂競圖一事採訪陳邁建築師和王紀鯤先生的內容如下：

陳邁建築師：「 ，其中一個評審 Catalano 是我以前美國的老師，過了一兩年後回來跟我們吃飯的時候說：『那時我們的作品是做得最好的，那沒有公布，就等蔣夫人回來，他們就說所有的東西都放那裡請蔣夫人去看一看，請她裁示。後來，她也沒有去看，就問說有沒有中國式的，而當時就只有楊卓成做中國式的，但是在這二十幾個案子中沒有一個是做中國式的。 』」

王紀鯤：「 。那時有兩派意見，一派是懷舊大中國（老一輩建築師）的路線；另一派是現代主義（陳邁建築師等年輕人認為有機會），而一直爭論不休，同時都很強勢。 。之後，真正評審時共有五個案子，而且是分別請兩外國建築師來寫評圖報告，當時台灣並沒有任何派出任何評審，而俞國華將兩位建築師的意見送到蔣夫人那裡裁示，因為她有這個資格嘛！後來就選中楊卓成的案子。而公告展覽也才展示兩天而已。」

透過上述訪談內容，可知蔣夫人是決定設計競圖的關鍵因素。雖然建築師有參與競圖的機會，但整個過程缺乏公平的競爭機會。

三、建築地點的選擇

中正紀念堂的建築地點選擇，當時籌建小組接受到各界人士建議：有人主張在士林，有人主張在慈湖，有人主張在外雙溪，意見甚多，但經籌建小組討論後，認為總面積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約七萬五千坪這一塊地區——也就是現址，最為適宜。當時總統府資政張群表示：中正紀念堂分二期辦理，第一期先設計中正紀念堂及中正公園，第二期再完成音樂廳及國劇院。由於音樂廳及國劇院是演奏及集會的場所，設在市區較為方便。另外，台北市的都市計劃缺乏綠地，將中正紀念堂周圍空地闢建為中正公園，對都市的整體發展也較為有利，所以決定選址於市中心（聯合報，1976.11.1）。

第二節 中正紀念堂空間意涵

建築形式是中正紀念堂空間特色的展現。此種建築形式，被賦予了某種形而上意涵，學者漢寶德提出了如是的觀點：建築是一種生活的容器，它的空間與造型是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所形成。它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¹。以哲學層次解釋中國建築的看法，乃以台灣戰後的建築界為主。國民政府遷台，傳統建築的研究止於思辨。同時，政府極力提倡傳統文化的復興，以傳統思想來解釋傳統建築成為風氣（漢寶德，1995）。

漢寶德認為：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之後，有顯著的保護主義色彩。這種文化的保守主義，在建築上尋求民族獨特性是理所當然的。²。所以國民政府在南京所建的政府大廈與紀念性建築，清一色為中國式。³雖然此一時期在建築的民族化上有各種嘗試，但仍以西式建築上加中式屋頂為主流，因帶有曲線的琉璃瓦屋頂是中國系建築的最顯著特徵。⁴今日之台灣，這種方向仍持續不變。官方建築在建築活動中所佔比例不大，但重要建築有進一步中國宮殿化的趨勢，較南京時代為保守，隱含鞏固統治之意念與返回大陸的期望（漢寶德，1995）。

1950年代末期後，國民政府開始有考慮長期居留台灣的可能，故政府的建築活動要能滿足國家神話象徵、地方政府行政、大陸來台人士居留問題等相關建築需求，因此國家及紀念性建築物、地方行政機關、國宅等方面的建築陸續出現。尤以1960年代起，國民政府為了表示自己是唯一正統的中華文化，在台北市興建了大量「北方宮殿式建築」來表達對大中國傳統的國家認同，如1965年的故宮博物院、1969年的忠烈祠²、1972年的國父紀念館、1973年的圓山大飯店及1976年破土的中正紀念堂等（鄧宗德，1991）。成為這時期意識型態下的安撫工具。尤其以北京紫京城中的太和殿來表現建築的「中國意像」，也是屋頂、屋身、基台這一種三段式立面會普遍出現的原因。這些建築物的共同特徵為：模仿清代中國木構架宮殿建築，使用圓柱、琉璃瓦、大台階、門窗、欄杆、裝飾花樣、彩畫等元素、反宇式屋頂。建築師們將1920、1930年代流行在大陸的宮殿式建築重新在台灣使用，並以鋼筋混凝土仿中國古建築來表現傳

² 當時除了台北外，也在其他地方興建忠烈祠，這一系列忠烈祠是為了對抗中共於中國大陸發起的文化革命運動。一般而言，忠烈祠多為各城市中日治時期的神社遺址，以宮殿式建築為既有的典型，及太和殿為模仿的對象而興建，其原來的儀典性及紀念性便一併被新建的忠烈祠承襲（趙飛虎，1976；石國宏，2001）。

統建築現代化，這樣一股風潮散佈在學校、教會、觀光設施、甚至閩南式的城門亦修復為北方宮殿式（石國宏，2001）。另一典型宮殿式建築的代表就是南海學園建築群中的科學館，其基地位置係由國家決定，若以總統府為輻射中心，北端（稍偏東）為台北車站、南端（稍偏西）為科學館、東端則是 1966 年改建為宮殿式的台北東門，近乎巴洛克式的都市配置手法，可說是國民政府結構性地塑造出一個國家權威的空間象徵（葉乃齊，1989）。

因此，在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政治意識型態下，「宮殿式」的支配性空間論述，重新塑造了台灣的紀念性建築，使其成為一個想像的北京城，一個「中國人所統治的台灣」之歷史意象（葉乃齊，1989）。中正紀念堂就是採用所謂「民族形式」的。從 1930 年代以來，重要建築物採用民族形式，一直被當作是一種政治要求。「民族形式」就是清代的官式，它象徵著政治和文化的正統性³。除此之外，也以其巨大壯觀的尺度，以及非日常可見的全景觀看角度，產生了一種奇觀憾人的感受，從而認同了官方領導的現代化進程。國家威權的性格也呈現在透過國家主導的意識型態之建築或空間形式上。

戴國輝對於戰後這種大尺度的空間設計，提出以下一些觀點：

「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結束之後，還留給我們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克服那套日本殖民地統治所留下的價值體系，而新創出我們自主的價值體系。光復之後，尤其 1949 年以後，台灣湧來了大批大陸的知識份子。大陸來的知識份子沒有台籍知識份子陷於日本殖民地長期統治的經驗，不但不具有「日本尺碼」，還因受「九一八」以來的長期侵略而具有抗拒日本之一切事物的深層心理。國府及台灣地區由於長期以來和美國的關係，人們另具有「尺碼」，暫時叫它做「美國尺碼」。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這些尺碼反映在建築設計上。

第一，其設計背景的思考方式和美觀意識與日本完全不同。

第二，好大，這一類氣質有點像美國佬。很可能是受到大陸性「風土」的類似影響。

第三，懷念大陸的補償心理反映在上述建築設計上。」

（戴國輝，1994）

中正紀念堂的建堂過程及建築形式，所呈現的精神猶如漢寶德在《建築與文化近思錄》（1995）一書中所表示：「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基於民族主義的政策，都有以語言及文化統一全國的企圖。

³國民政府以對清帝國統治權之接收，文化內容之延續等方面來宣示其「正統中國」的地位。

在建築上，雖未盡成功，但以大一統心態從事建設，是中央集權政府的特色。」

那麼，究竟如何透過空間形式來彰顯「中國意識」呢？擔任中正紀念堂設計工作的建築師楊卓成表示，蔣公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熱愛中華文化，尤其對中國建築，每遇之必躬親指導設計，興致勃然，因此，他秉承此一宗旨以設計蔣公紀念堂。構想的要旨是，此堂應為中國式，所以參研中國歷代建築，將其融會貫通，吸其精髓，以期創造出一種新風格。這座具有永久性建築物的設計型態，是與追隨蔣公多年的一些黨國彥碩們所研討出來的，每一部份都有它特殊的意義：

（一）紀念堂

採北平天壇之頂、金字塔之體，下基襯托三層寬大台座，在平坦的基地上將主體提高，以顯出穩若磐石的雄姿。凸起的土丘上之三層臺基，象徵三民主義。臺基下部繞以一百六十公尺寬的方形土坡，平時植草以求水土保持，每遇慶典則植滿紅花；此一構思，形成青瓦、白牆、紅花，正好如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象徵（中國時報，1980.4.3）。

整個紀念堂的整體構圖上乃要表現蔣公復興中華文化的哲學，因此設計以正方形為主，坐居中位，以適「中正」之意。堂頂色彩用天壇寶藍色之琉璃瓦頂，藍中帶紫，與七彩的陽光相映，予人以高貴的感受，與一般純藍不同。寶頂用金黃色，強調其光耀昇華之意。屋頂、斗拱與外形深富哲理，和睦建築師事務所表示：「蔣公的『天人合一』思想，以人為中心，本乎人性，順乎自然的哲學思想，發揮在建築上最為明顯的是，從四方面看都是『人』字形的中國式屋頂，建築物自地面台階、牆柱、樑枋，自屋頂而天空，將『人』與『天』聯繫起來，居屋頂最高點的金色寶塔為昇華天人之間的媒介。斗拱從『人』住的空間進入『天』的空間的第一步，亦為天人合一的思想導出建築結構，而舉架之應用使屋頂上峻下緩而形成飛簷，為『人』的空間進入『天』的空間之第二步。正身四角突出四個支座，與人以極安穩之感，象徵著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參見圖 5-2）。」（和睦建築師事務所，1976；廖建彰，2001）

（二）紀念堂內之展示空間

紀念堂內展示了蔣公銅像、古董車、生平事蹟等。大幅的油畫懸掛在牆上，圖說蔣公黃埔建軍、攻克惠州、北伐誓師、抗戰勝利

及金門砲戰等事蹟。整個紀念堂內的展示空間，充滿了緬懷的味道，讓民眾對蔣公生平有更多的認識。

（三）大門

蔣公在生前對方向很重視，喜面東南朝西北，因此，公園及主館大門面向西北，與總統府遙遙相對，互相呼應，成為迴龍故祖之象徵。另外，也有西進反共之意圖。

（四）公園

中正紀念堂的公園設計，是由楊卓成建築師之弟，庭園設計師楊卓然設計。他表示：中正紀念堂公園是環繞中正紀念堂規劃，使公園與正堂成為一體，合則有襯托正堂之功，分則有各自獨立良景之美，各主要通景線均以正堂為主（中國時報，1980.4.3）。

1980年4月4日，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暨先總統蔣公逝世五週年紀念大會中，前總統嚴家淦以「毋忘遺訓、力行遺訓」為題致詞，其文如下：

蔣公離開我們之後，海內外同胞紛紛自動捐款。一致要求籌建中正紀念堂，以為永久的紀念，並以此作為瞻仰中心。；面對這一歷史性的堂景，無不有一種聖潔、莊嚴和親切的感覺。從今天起，凡是來到中正紀念堂的人，必可領略牌樓的巍峨壯觀，廳堂的莊嚴雄偉，「大忠門」、「大孝門」的寓意深長，乃至庭園之美、花木之盛，不僅表現出中華文化的風格，由能顯示蔣公廣闊的襟抱，遠大的眼光，及其生平大智、大仁、大勇的志節，與大中至正、大忠大孝的德行，令人肅然起敬。，當三十八年之初，共匪全面猖狂叛亂的時候，就曾考慮到建設台灣的重要。及至大陸淪陷，政府乃播遷來台，其時人心惶惶，局勢危急。蔣公遂毅然決然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領導全國居民，重振革命的事業，進行反共復國的神聖戰鬥。並在復行視事的文告中訓勉國人，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乃是反攻勝利的前提，亦是復國建國的基礎。同時，更指出建設台灣的積極價值和崇高意義：「我們建設台灣，是要以台灣作為一個反共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台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在於亞洲、在於全世界人類。其空間的範圍固不限於台灣，時間的範圍也不限於目前」。

在前總統嚴家淦的致詞中，清楚地表達了中正紀念堂在空間形式上的意義及其精神呈現。

第三節 小結

中正紀念堂的開發歷程，有著深厚的中央集權色彩。其空間設計，更含攝強烈的中國意識、中國精神。在蔣介石去世不久，「蔣公精神」及各種紀念活動極其興盛。紀念堂落成典禮暨先總統蔣公逝世五週年紀念大會時，中外來賓共有四千人參加。當時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召集人俞國華表示：中正紀念堂的興建乃是海內外同胞為永懷蔣公而捐獻落成的，當時各界捐獻已達二億三千餘萬元（中國時報，1980.4.5）。而中正紀念堂首日開放就約有三十萬民眾去瞻仰巨幅畫像。另外，由台灣省和台北市登山社團、救國團、經濟日報、聯合報等四十三個單位聯合舉辦的蔣公九秩誕辰紀念登山活動，參加民眾超過十萬人。當時民眾以捐獻及參與中正紀念堂紀念性活動來表示對蔣介石的追思。但這樣的情形已今非昔比，一方面是距蔣介石逝世較久遠，另一方面是思潮已有所改變。在蔣公時代，民眾瞻仰蔣介石，視其為民族救星，但隨著解嚴後的言論自由，許多正反的評價都有，台灣的定位也不再只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使得中正紀念堂這個公共空間愈來愈多樣化，不僅是總統以軍禮歡迎來訪各國元首及貴賓之處，也是各國觀光客來台參訪時的景點及民眾抗爭、舉辦文藝活動的地方，只是中正公園相形之下，猶如配角，較少受到民眾的青睞。

下表 5-1，為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的權力三面向分析。權力第一面向探討政府和市民的權力大小，權力大者將取得最後決策權，在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案例中，決策權是由中央政府在主導的，所以政府的權力遠大於市民；第二面向說明了中正紀念堂空間決策過程中，由政府主導，民眾被排除在議程之外的情形，如中正紀念堂取代了現代商業化中心、中正紀念堂競圖過程等；第三面向則分析政府如何透過空間形式，來展現中國意識，使其更具統治正當性。這如同 Ernest Geller 的觀點：國家必須透過各種機制，尤其是教育系統，來創造一種「高度文化」和「國族意識」，並滲透到社會之中，而且由政治來維繫及界定其意涵。換言之，現代國家需賴文化和一種集體意識的建構，並與軍事、政治體制相互依恃而運作，共同完成「建國大業」，並維繫其「長治久安」(彭懷恩，1997)。

表 5-1 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的權力三面向

時期	權力的運作	政府	市民
國民政府威權時期	權力第一面向	權力大	權力小
	權力第二面向	市民被排除在議程之外(興建中正紀念堂的決策過程是由中央直接決定)	
	權力第三面向	中國式建築設計及中國文化精神之呈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5-2 中正紀念堂空照圖（陳敏明攝）